

柳宗元

研究论文选粹

尚永亮

李芳民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柳宗元
研究论文选粹

尚永亮 李芳民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宗元研究论文选粹 / 尚永亮, 李芳民主编.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115-5563-2

I. ①柳… II. ①尚… ②李… III. ①柳宗元 (773-819) — 人物研究 ②柳宗元 (773-819) — 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46625号

书 名: 柳宗元研究论文选粹
主 编: 尚永亮 李芳民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刘天一
封面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3105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84千字
印 张: 23.5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563-2
定 价: 69.00元

编委会

主 编 尚永亮 李芳民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国安 王基伦 邓小军 孙昌武

吕双伟 李 浩 李芳民 杨金砖

张 勇 陈松柏 尚永亮 罗小芳

莫山洪 莫道才 翟满桂 蓝天强

蔡自新 霍旭东

目 录

柳宗元与长安

——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 尚永亮 001

柳宗元经学思想研究..... 李伏清 唐琦露琴 005

论柳宗元的尧舜之道..... 关永利 019

柳子论孟及其文化意义..... 张 勇 026

论柳宗元辅时及物之“道”..... 翟满桂 038

柳宗元文学理论主张论略..... 崔际银 050

政治立场的表态与地方治理的思考

——柳宗元、刘禹锡与元洪三书笺释..... 查屏球 060

略述柳宗元“吏为民役”之道..... 王 良 081

柳宗元思想研究百年述评..... 刘真伦 岳 珍 086

唐人诗文及史书中的“商颜”小考

——兼谈刘禹锡柳宗元初贬所经路线..... 尚永亮 110

论柳宗元佛教题材文章及其价值..... 李芳民 124

柳宗元饶歌的文学及文学史价值..... 李宜蓬 142

从器物复古到精神复古

——柳宗元的乐府雅诗述作历程的再探讨..... 陶成涛 152

论柳宗元山水诗文空间书写的原型结构..... 邱 晓 161

柳宗元文引用《周易》之探讨..... 梁煌仪 176

文本的继承与讹变

——柳宗元《饶娥碑》的文本争讼及阐释变迁..... 刘 晓 191

柳诗“双璧”中几组意象的政治寓意和道德潜词..... 成少华 李向阳 207

关于柳宗元《霹雳琴赞引》的解读·····	董灵超	211
柳宗元对河东卫门书派的接受初探·····	祁世坤	221
元结、柳宗元湘南山水文学之比较·····	肖献军 潘雁飞	225
论苏轼评价柳宗元的变化过程及原因·····	步 童 陈向春	236
柳宗元及其作品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苏 岑	256
南宋郑定刊《重校添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现存修补本探考 ·····	[日]户崎哲彦	276
日本学者对柳宗元研究的拓展与掘进		
——以清水茂、下定雅弘、户崎哲彦为例·····	吕国康	311
论柳宗元的干谒与被干谒·····	严寅春 蒋旅佳	324
柳宗元对唐代狂士文化的批判		
——重新检讨《李赤传》《黔之驴》的创作动机·····	万德敬	342
场域变化与柳宗元的长安情结		
——以“追诏回都”诗与“赴柳之作”为例·····	王 平	350
永州祭祀柳宗元特征探述·····	吕娟娟 郭 星	363
编后记·····		369

柳宗元与长安

——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第八届年会
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尚永亮

各位代表，各位同仁：

在金风送爽的仲秋时节，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古都西安召开了，在此，我谨代表学会理事会，向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承办此次会议的西北大学文学院和会务组的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为今年的会议是在西安举办的，所以，我想多说几句柳宗元与西安的话。

大家知道，西安是唐代都城长安所在地，也是子厚先生生活最久的地区。在子厚的一生中，大致和四个地区发生联系，一是河东，一是永州，一是柳州，再一个就是长安了。在这四个地区中，河东是他的祖籍，他本人并未在河东生活过；永州、柳州是他的迁谪地，在这两个地区，他分别生活了十年和不足五年，而在长安，他则生活了三十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子厚四十七年的生命历程中，有三分之二的光阴是在长安度过的。这样看来，子厚与长安便有了一种更为深厚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

首先，长安是子厚的生长地。关于其出生地点，现有两种说法，或谓生于吴地，或谓生于长安，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改变不了子厚从小生活在长安的事实。在为其母所写《归祔志》中，子厚说了这样一段话：“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由此可知，子厚自幼即与母亲居住在长安城西，诵赋习字。这里的“城西”，据相关学者考察，当在长安城西洋河东岸一带，亦即《种树郭橐驼传》中郭橐驼

所在的丰乐乡（张永禄《唐代长安辞典》）。稍长之后，其家又先后移居长安城核心区域的善和坊和亲仁坊，此二坊分别在今西安朱雀门外西侧和友谊东路一带，由此，子厚遂得以进入长安上层文化圈，以其“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丰厚学养“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子厚乃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长安人，而且是长安文化圈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

其次，长安为子厚的参政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平台，正是在这里，他的政治生命达到了一生中的顶点，同时，也使他由此被贬，万死投荒，饱尝生命的磨难。细读柳集可以发现，在子厚思想中，深存着两个意念，一是家族复兴，一是推行利安元元的大中之道。而欲复兴家族，利安元元，就必须参与政治。所以，自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后，他便时时留意理民治国之道，写下了《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等文，并在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等官职的历练后，于贞元二十一年被擢升为礼部员外郎，积极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革新运动。这场革新，是唐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子厚生命由高而低的转折点。“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縲囚。”子厚在《冉溪》诗中所说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他一生思想、心态乃至生存状态的典型写照。在中国古代，政治对文人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实现理想，一方面也可能以其饱含的残酷使你身败名裂；一方面可以使你超越狭隘的小我局限，拓展视野，焕发激情，另一方面也可导致你在荒远的贬地受苦终身。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政治虽给予子厚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人格，孕育出了他深邃过人的思想和一系列文学精品。他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他在咀嚼痛苦中的反视内省，他对历史、政治、人性的深刻认知，他的“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似乎都与政治给予他的这场灾难相关。就此而言，子厚的一生可谓败也长安，成也长安。

再次，长安是柳宗元后半生最为思念的地方，由此形成他浓得化解不开的长安情结。仔细分析这种情结，大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故乡回归，一是政治回归。就前者而言，大凡被贬者，无不对故乡存有一份至深的思念，因为只有回归故乡，才能使他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清人方东树所谓“涉世险艰，故愿还故乡。故乡者，本性同原之善也。经疾忧患危惧而后知悔，古人无不从此过而能成德者也”（《昭昧詹言》卷二），指的便是这种情况。翻阅子厚在永州、柳州所作诗文，无论是“凭寄还乡梦，殷勤到故园”的《零

陵早春》，还是“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的《登柳州峨山》，表现的都是那缕日夜缠绕他的乡关之情。他始终忘怀不了的，是长安城西“先人手自植”的“树果数百株”，是“尚在善和里旧宅”的“赐书三千卷”（《与许孟容书》）；情到激烈处，甚至不惜“化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就后者而言，回归朝廷再度参政是他更主要的心理动机。对子厚来说，从政是他的初衷，只是当政治家做不成时，才不得已而成为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在他内心深处，何尝一日忘怀过政治？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只有回到长安，回到朝廷，他才能雪冤洗耻，才能重展经纶。所以，他在永州贬所不断地向在朝亲友写信呼救、求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回到长安，再度参政。当然，在唐代历史上，像子厚这样抱有长安情结者比比皆是，盛唐的李白、杜甫，中唐的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元稹，都是如此，但身为长安人，在长安参加了重大政治活动，而又因此被贬荒远长达十余年者，却并不多见。就此而言，我们说子厚的长安情结最为浓郁，恐怕不是虚言。

最后，长安是子厚的归葬地。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八日，年仅四十七岁的子厚在遥远的岭南之地柳州辞世，次年的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据柳集多篇志文，知柳氏先人墓茔在万年县少陵原北之凤栖原（又名栖凤原），另据宋人洪兴祖《韩集辨证》，“京兆万年县司马村”尚有“柳子厚铭”（方崧卿《韩集举正·叙录》引），而据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十载：柳碑乃“韩愈撰，沉传师正书。碑以元和十五年立，在凤栖原墓前，碑碎”。综合这些信息可以概括推知，子厚墓当在今西安城东南少陵原一带之司马村，墓碑宋时尚在，至元已碎。世事沧桑，陵谷代变，如今的司马村尚在，但已寻觅不到子厚坟墓的踪迹了。由此给西安市政府和柳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即如何考订史实，开发、重建子厚墓园？如何保护历史名人遗迹？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子厚的肉体 and 灵魂，在历经漂泊困苦之后，终于回到了他魂萦梦想的故乡，长眠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乃是对他的最好告慰，同时，也使柳宗元与长安的联系得到了最终的落实。

如上所言，子厚与长安存在着远超其他唐人的紧密关联，可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我们对这种关联的认识和研究却是颇有不足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内专门考察柳宗元与长安的论著偏少，而西安学界对此一问

题的关注度也明显不够。就我所知，在西安的老一辈学者中，较多涉足柳学研究的，当推我的两位老师、陕西师范大学的霍松林先生和高海夫先生；在新一代学者中，研柳成果较多的，主要是西北大学的李浩、李芳民教授等几位学者。这样一种情况，是远远不能与子厚的文学地位及其与长安的丰富关联相匹配的。另一方面，中国柳宗元研究会自1993年成立，迄今已二十余年，共召开了七次年会暨国际研讨会，其中柳州、永州各2次，永济、晋城、运城各1次，但西安尚未有一次。大概正是考虑到此一研究失衡的局面，早在晋城会议上，我们就提出了在西安举办柳学会的设想，此后经过多次运作，也经过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大力支持，今天终于在这座古老都市顺利举办了第八届会议，这是极具意义的一件大事。我想，子厚先生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各位朋友，这次会议，除了深入研讨举办方所拟定的七个议题外，还要进行学会理事会的改选工作。我希望，通过这次选举，组成一个更具活力的柳学团体，既推动全国柳宗元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为西安地区的柳研活动带来大的促进。

最后，祝各位在会议期间心情愉快，收获满满。谢谢大家！

柳宗元经学思想研究

李伏清 唐琦露琴

经学由汉学向宋学蜕变的实现，得益于解经范式的变革（即治经模式由重章句向重义理的转变）。^①而解经范式变革借以实现的手段，在中晚唐已现雏形，而且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而日渐清晰。柳宗元采用内外结合、双管齐下的方法，主张严格区分经传同时兼以疑古、辨伪，儒学内部以前二者为要，于儒学外部又以辨伪为轴，这些方法都体现了意欲争取儒学独尊、复兴儒学的目的，推动了解经范式变革胚胎阶段的进程，为宋学疑古、惑经和辨伪的全面上演拉开了序幕。

一、舍传求经

就《春秋》而言，在解经范式变革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对经、传关系的处理。由汉及唐，《左传》等传本备受时人关注。随着唐代复兴儒学、“复古”思潮的涌起，舍传求经、批传重经成为时代的呼声。新《春秋》学派对以往的《春秋》传注“考核三传，舍短取长”，主张以己意去取三传，合而为一，倡导以经为本、“舍传求经”之风，为宋学尤其是朱熹的经传相分、以经为本、直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拉开了序幕。

舍传求经与舍章句重义理的主张具有内在一致性。啖助在批评《春秋》传注之学的流弊时提出了宗经之本、不迷于注疏的思想。他指出，《春秋》经文虽然简易，但其理却已昭明如日月，而固守章句注疏之学者，各自只关注一传，三传未能相通且互相攻驳，各执己见，其学留于注疏，不重本经，因

① 详参拙文《中唐解经范式变革发微——以新〈春秋〉学派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注迷经，因疏迷注，以致“不识宗本”。暗示新治经模式应主张舍传求经，以经为本，而不以传注为本，是对但守章句、惟重疏注的传统经学的大胆怀疑和革新，预示了经学发展的方向。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云：“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

柳宗元也主张严格区分经传以求经。所谓严格区分经传主要表现为对“近经”的批判。

何谓“近经”？“近经”指围绕《经》而展开的传记之类，如《春秋》为经，后人围绕《春秋》有《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三传以及《邹氏传》和《夹氏传》等。^①这些著作一般被当作儒家经典的权威受人供奉而不为质疑。柳宗元严格区别“经”和“传”（“近经”），对于“传”，坚持理性区别对待，如针对《左传》《国语》的观念进行批驳而作《非〈国语〉》六十七篇。另外，针对《左传·隐公三年》“六逆”之说而成《六逆论》；针对《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所记载孔子“守道不如守官”之说而作《守道论》等。除了对传的评判，柳宗元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其他，如针对《礼记》中的“月令”篇而作《时令论》；针对《管子·牧民篇》之“四维说”而作《四维论》等。

对于“近经”批判对象的选择，柳宗元热衷于选择地位较高的“近经”。《国语》的选定根源于内容风格极为近似的《左传》（时人有《春秋内传》和《春秋外传》之说）。《左传》自两汉六朝以来备受士人吹捧，在唐代又获得了九经之“大经”的地位。另外《礼记》《月令》也被时人尊为“近经”。战国后期，阴阳家把这种按时令行事的认识与五行附会，并结合儒家使民以时的政治观念而成“月令”。《月令》发展到后来成为儒家典籍《礼记》的重要部分，具有法典性质，是朝政行事的依据。《月令》具有“天命”观的性质，是汉代以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具体表征之一。故《月令》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后来，李吉甫受玄宗之敕刊定《月令》并改名《时令》，将其提到《礼记》五十篇之首。到贞元年间，朝廷又诏令通儒对《开元礼》和《月令》彼此矛盾之处进行修改并钦定之。贞元六年二月，朝廷诏书“自今已后每至四孟月迎气之日，令所司宣读《时令》，朕当与百辟卿士举行之。”^②柳

① 参见《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文中注，《柳宗元集》卷九，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下引用该文出自同一版本），第208页，另见《汉书·艺文志》。

②（清）董诰：《全唐文》卷四七七，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以下引用此文出自同一版本），第4874页中有杜佑《读〈时令〉议》之文。

宗元正是敢于向权威挑战，而作《时令论》上下两篇，有的放矢，直指当朝现行制度。在《时令论》中，柳宗元除了对其天人感应论进行批评外，还认为《月令》并不是如传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夏后、周公的旧典。陈澧《礼记集说》卷三中曾言，《月令》不过是礼学记事者杂举三代秦时之事拼凑抄合而成。柳宗元在《非国语·下》的后序中曾言，“读者莫之或非，反谓之近经。”《时令论·下》中有“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谓君人者法也”。柳宗元反对将《月令》等近经当作规范人伦、政治的权威。这种对“近经”的批判正是柳宗元在复兴儒学中对“经”的维护，是对儒学精神要旨——圣人之道之重新伸张。

柳宗元严格区分“经”和“近经”，强调传体本身在流传过程中有失真附会的现象。实际上《经》《传》合并中所衍生的史实倒错现象在三传中相当普遍，其中以《左传》尤为明显。关于三传经文之间的异文，啖助等在《三传经文差谬略》及其《补阙》中根据上下文及义理整理出近三百处。

其次是求经，维护“经”之“本”的地位。柳宗元主张为文者“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①称颂吴武陵“多举六经圣人之大旨，发言成章”^②；尤其他在分析为文取道之原之时，于《经》的地位的认可，一目了然，“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③但于“传”或“近经”方面，柳宗元主张以之为参考而不可以之为文的根本宗旨。认为“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等等。柳宗元于经和传的这种取舍态度很明显得益于啖、赵、陆之思想。于春秋三《传》，柳宗元同样主张“一”其“理”，而其所“一”的方法，就在于舍传求经，直观“圣人之心”和孔子之“微言大义”之奥域。此外，柳宗元还认为，圣人为大经在于以中道立中正而去佞邪，在于行圣人之道，所谓“故圣人为大经，以存其直道，将以遗后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邪……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④坚定圣人之道在于立大中之道，在于去邪弃佞之惑，而且圣人作大经在

①（唐）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第880页。

②（唐）柳宗元：《濮阳吴君文集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一，第581页。

③（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二十一，第873页。

④（唐）柳宗元：《时令论·下》，《柳宗元集》卷三，第88—89页。

于存中道。即“大经”是中道的载体，强调“大经”的地位和作用，以此说明复兴儒学之道在于存经、重视大经以探究大中之道。

先秦时期，孔子或述或作六经，将圣人之道融于《经》中，《经》与道水乳交融。由此，通过全部经传去探讨孔子之道，成为后人的追求。正是这种探究，以往经道浑然一体的状态逐步瓦解，道从经中分离，经及衍生出的“传”成为传道的载体，经、传越来越失去先秦时期的那种崇高的地位而为人所忽视。道逐步由经传而转向“我心”，逐步呈现儒学从外在章句训诂学向内在心性学的转变。中晚唐儒学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交接地带，正是从章句之学向心性学也即汉学向宋学转变的中间地带，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中晚唐儒学在儒学复兴运动中，打出了“复古”的旗号，其“古”即古代圣人之言论经说。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唤起人们对“经”的重视。由“经”而得“道”与由“我”直观“圣人之道”之间并非存在隔阂。这种“舍传求经”“依经得道”之“由我而得”的解经范式直接开启了宋明经学的大门。如宋初三先生的孙复直接受到“直接以经文为出发点”“由我而得”的解经方法的深刻影响。另外，在对“经”本地位的论述时所涉及的对象，尤其是对《孟子》一书之经本地位的认识，也为宋学中的四书五经之说的最终定位以及孟子的升格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疑古

象山曾言“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①怀疑精神是儒家精神的内在生命力。唐代疑古、惑经的对象涉及经、史、子、集。

就经部而言，主要有：司马贞对《子夏易传》真伪的辨疑；韩愈对《诗序》作者的辨疑以及与李翱一起对《论语》的质疑和辨析；韩愈与门生张籍对《孟子》编者的辨疑；成伯玙对《诗》大、小序的辨疑；赵匡对《礼记》《周官》作书时代的辨疑；啖助、赵匡、陆质诸人对《春秋》三传的辨疑；司空图对《春秋》经、《古文孝经》的怀疑；柳宗元对《论语》编者的辨疑。于史方面，与经之《春秋》紧密联系，如刘知几的《史通》及新《春秋》学派的主张（包括柳宗元的《非〈国语〉》六十七篇以及《辩晏子春秋》等）。子

①（宋）陆九渊：《陆九渊集》，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2页。

学方面如杜佑对《管子》的怀疑、柳宗元对《列子》《文子》《鬼谷子》《亢仓子》《鹖冠子》子书的辨伪或怀疑等。他们对经典的考辨虽然谈不上系统全面，但提出的问题直接启发了宋人对经典的怀疑和论辩。他们不囿陈说的大胆怀疑精神对推动怀疑学风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为宋学的解经思潮拉开了序幕。

柳宗元的疑古思想集中体现在《非〈国语〉》《六逆论》《四维论》《赧说》《侵伐论》《断刑论》以及《月令论》上下篇等文中，我们以《非〈国语〉》为例，窥探柳宗元的疑古方法。

柳宗元在《荀息》中指出，研究《春秋》不要停留于文辞，而要探究“圣人之情”，于经文中把握其“微言大义”。所谓“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谓信道哉！”^①《国语》中有许多关于祥瑞、灾异、命数、禄相、卜筮、神怪、妖异、谣应等记载，是关于“天命”论和“天人感应”学说的直接表述。柳宗元以此为的，对《国语》进行了全面的批判，集中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他对《国语》六十七篇的非议贯穿着对大中之道的倡导。我们通过对柳宗元《非〈国语〉》各自独立的六十七篇笺疏体进行整理，一览对《国语》行文所载之事的批评。

首先，批评《国语》的某些说法是诡怪浅陋迷惑之说。如《左史倚相》中指出王孙圉神化白珩为“能使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柳宗元认为，若真如此，则为“覼之妄者”；《柯陵之会》篇就单襄公以晋厉公、郤锜、郤犇、郤至、齐国佐等人的面相由此断定晋将有乱之说，柳宗元指斥单公为巫史，其说“迂之大者”，并感叹单公为何没有遭受贬谪；《神降于莘》篇就内史用“有神降于莘”以征虢将于五年后灭亡而左氏为之书之说，柳宗元斥之为“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大钱》认为“召灾”之说“未之闻”，而且借用《内传》“王其心疾死乎”以证明左氏为书多为此类怪诞诡异之说；《仓葛》篇通过批评《国语》周襄王避昭叔之难之记载，指斥左氏乃“耄者”；《郭偃》篇就郭偃用口以纪三辰，有言宣五行，由此来预卜祸福吉凶且精确时纪之说，柳宗元斥之为愚蠢荒谬至极之说；《舆人诵》篇认为惠公等人的下场是咎由自取，而《国语》所载郭偃神化众人之口，且认为众人之说为“祸福之门”之言为浅陋之说；《观状》篇指出观重

①（唐）柳宗元：《非国语上·荀息》，《柳宗元集》卷四十四，第1297页。

耳之骈列肋骨者为曹公而非郑，而《国语》载之为郑，柳宗元认为这种违背历史史实的记载为胡言乱语，批评左氏之说“多为诬者且毫”；《长鱼矫》中批评左氏“多为文辞，以著其言而征其效”，若言矫知“几”，则为迷惑之甚之言；《祈死》中指斥范文子祈死且得之之说为大妄诞者；《赵文子》中指出左氏《内传》之“人主偷必死”以及《国语》之“死与大咎，偷之能必乎尔”之说为浅陋之言。

其次，柳宗元认为某些神怪征兆之说肯定为好事者追而为之，或者本身就是左氏牵强附会以自成其说。这一观点是对刘知几观点的承继。如《城成周》中认为《国语》中彪偃持天所坏之说，由莒弘、刘文公扩建“成周”城来断定莒叔必速亡，魏子亦将及。《国语》以莒弘不久被杀，刘氏亡于定王有证验之，柳宗元认为这种“当身”“速即”之说，乃后来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于事后牵强附会追述的诬陷之言；《不藉》篇就虢公将宣王不藉千亩当成将败于姜戎之征，《国语》还真以之合验之说，柳宗元斥之为牵强附会荒诞之说；《郤至》指出“因以列数舍郑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为奸，则是后之人乘其败追合之也。”^①《卜》中指出“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迁就附益以成其说”^②这种迷惑神怪之说不可取。《葬恭世子》认为郭偃“知君嗣二七之数与重耳之伯”之说，“是好事者追而为之，未必偃能征之也，况以是故发耶”^③。《乞食于野人》认为《国语》所记载的子犯“推天引神”之言定非子犯所言，而是“后之好事者为之”。《杀里克》批评郭偃“不谋而谏不忠，不图而杀不祥。不忠受君之罚，不祥罹天之祸。受君之罚死戮，罹天之祸无后”“以配君罚天祸”之说，柳宗元认为此“皆所谓迁就而附益之者也。”^④

再次，柳宗元认为《国语》中不少观点绝非圣人之言，相反是诬陷圣人，玷污圣人之名。《跻僖公》中认为，柳下惠对夏父弗忌评论之说不可靠，“非士师所宜云者”，认为“必有殃”之说定为左氏借助柳下惠之口所言，为左氏本人的浅陋之说。《黷羊》中，柳宗元将《国语》中关于孔子神料黷羊而非狗之说指斥为“是必诬圣人矣”，同时也指斥后来史书如《晋书·五行志》“地坼犬出”以及近世杜济穿井得缶中狗且投于河化为龙等“穷异以

①（唐）柳宗元：《非国语上·郤至》，《柳宗元集》卷四十四，第1275页。

②（唐）柳宗元：《非国语上·卜》，《柳宗元集》卷四十四，第1291—1292页。

③（唐）柳宗元：《非国语下·葬恭世子》，《柳宗元集》卷四十五，第1301页。

④（唐）柳宗元：《非国语下·杀里克》，《柳宗元集》卷四十五，第1302页。

为神”之说为妄。《律》篇认为州鸠之说实在是“诬圣人亦大矣”。《骨节专车桎矢》篇中，柳宗元认为孔子不好“穷物怪之形”，《国语》所载孔子辩吴王会稽之骨节为防风氏之骨节以及陈侯庭院中所坠死的鸟中的箭是北方肃慎氏之箭这两件事不可靠，认为这些诡异之言语为圣人所不耻，由此认为左氏玷污了圣人的名誉，而且借助孔子之言左丘明“多能鄙事”之说以证明《国语》此言是左氏对孔子的污蔑。柳宗元的这些评论正表现出他对圣人的尊崇。

柳宗元认为，正因为《国语》中不少的观点是鬼怪荒诞浅陋之说，非圣人之言，故“无足取”，为君子所不宜。如《三川震》中将三川之地震当作西周将亡的征兆，以“源塞”之因而精确西周将亡的期限不过一纪的说法；《灭密》篇中康母认为康公不献三美女予恭王，则康必亡，而左氏以密灭为之征验之说；《料民》中仲山氏“惑于神怪愚诬之说”，甚至以之诿后嗣之说；《律》中乐官州鸠所谓“律吕不变”则平正而久而纯而终，最终“礼乐治国”有“成政”的观点；《晋孙周》中单襄公列举周之一德与天六地五之数相合之谬说；《不藉》中将宣王败于戎牵强附会于不藉千亩，且还预言战于千亩之说；《童谣》中以童谣来占卜作战日期之说；《虢梦》中舟之侨以虢公之梦而断定虢将不久之说；《宰周公》中宰孔预言晋献公将死之说；《祀》中子期认为祭祀除却昭孝外，还可“息民”“抚国家”“定百姓”故不可废除之说；《叔鱼生》中那种以婴儿之相貌、声音来断定其命运、死亡或者以鬼事推断之之说；《伐宋》中赵宣子就宋人杀昭公，称“是反天地而逆民则也，天必诛焉。晋为盟主而不修天罚，将惧及焉”而请师以伐宋之言；《褒神》中史伯之褒神流祸的荒谬说法；《韩宣子忧贫》中那种将人的善恶决定于先人，自己无力改变的观点等等，柳宗元认为这些说法皆“无足取”，为君子所不道者，“不足书以示后世”，认为载于史册是有害于圣人之道之教化，《国语》书之甚至征验之不可为不荒谬。

以上是柳宗元于“道”的角度对《国语》所做的批评。柳宗元对《国语》的这种批驳指斥，是对新《春秋》学“以经驳传”方法的承继。如《守道论》中引征《礼记》之“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和《孟子》“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之说来说明“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与”的观点，以此论证自己“官也者，道之器也，离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